中國與世界秩序評論

论“中国之治”的政治机理：团结型政治的视角

本期作者：杨光斌、周楚粤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主编：杨光斌
总第八期

（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中國與世界秩序評論

论“中国之治”的政治机理：团结型政治的视角

本期作者：杨光斌、周楚粤

主编：杨光斌

总第八期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Chenghai Institut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编者的话

澄海高等研究院定位于基于学科发展的战略议程研究机构，这一定位源于学科是战略议程研究的专业化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推动的两个学科性概念，即历史政治学与世界政治学，是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成果，而这两个学科性概念的发展还要依赖于对“中国政治发展”（CPD）的深耕。鉴于中国在世界文明史和当下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尤其是“中国之治”对既有社会科学的挑战，对 CPD 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和中国之于世界秩序的作用；认识世界首先得认识中国自身，只有更深入地研究中国，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

本期聚焦于“中国之治”的政治制度如何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于“中国之治”“中国模式”有各种解释，有人甚至认为为了显示中国经验的普遍性而不主张“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之说，这

是非历史主义的。既有经验和理论的“普遍性”都是从地方性、特殊性而来的。我们认为，中国模式所呈现的“中国之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很多国家、地区的政治分裂导致的“无效之治”而言的，而“中国之治”的政治基础就是“团结型政治”。本研究力图解释团结型政治的结构、机理及其蕴含的制度潜能，探索政治制度决定性作用的内在逻辑。

论“中国之治”的政治机理：团结型政治的视角

杨光斌 周楚粤

摘要.....1

一、“团结型政治”研究简述.....4

二、团结型政治的结构与机理.....11

三、团结型政治的制度潜能.....26

四、结语：作为自主性概念的政治团结学.....38

论“中国之治”的政治机理：团结型政治的视角

杨光斌 周楚粤

摘 要：“中国之治”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研究议程，而且这种研究将直接贡献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的自主性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对本国历史经验的深度发掘基础之上。本文从人民政协制度出发展开考察，发现这一制度所体现的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事实上是一种“团结型政治”的宏观制度体系，解决了团结谁、谁来领导和组织、如何团结三个关键命题。团结型政治是“中国之治”的制度性根源，其独特的制度潜能包括但不限于：在当下维系了大一统的历史延续，增强了政策目标的确定性长远性，汇聚政治势能，形成“团结的民主”与“民主的团结”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本文探索“中国之治”的政治制度决定性作用机理的理论启示是，“政

治团结学”无疑是一个自主性概念，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应进一步开拓政治团结学的理论空间，探索中国政治团结的历史经验与技艺。

关键词：中国之治；人民政协；团结型政治；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潜能

作 者：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周楚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生。

“中国之治”值得世界社会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可以直接贡献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的自主性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对本国历史经验的深度发掘基础之上，二战前的欧陆政治学是这样，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基于对“美国政治发展”研究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也是这样。然而，120 多年来，中国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拿既定的概念和理论去诠释中国，而不是以中国经验去发展政治学理论。事实上，若深入观察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可以发现其运转的机理与中国之治的治理绩效有直接关联。其蕴含着宝贵的政治学理论，

值得逐个研究或者一体化研究。比如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政协，其结构和运行机理就体现了中国团结型政治形态的方方面面，为中国之治奠定了制度基础；以它为案例也是学术研究的可操作性的需要。

现代化进程中往往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维持共同体内的协调稳定对各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众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亨廷顿所言的政治衰败和相应的社会动乱与经济停滞，近年来众多发展中国家乃至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因种族、宗教、贫富分化等社会撕裂现象而陷入严重的民主治理困境。这些经验事实都显示出团结的重要意义，如林尚立所言，未能将民主对团结的需求纳入民主化的重要战略是民主挫折的重要原因。[1]与之相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优等生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客观上实现了中国之治，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2]这两大奇迹作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治发展最鲜明的特点，与中国的团结型政治有紧密关系。[3]

团结型政治指各个权力主体（种族、民族、阶级、集团等）的协调共存以及由此构成的国家的协调稳定。[4]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重要的实

践经验，团结型政治在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团结可以促进合作奋斗，减少分歧、促进稳定，“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5]

政治制度是构成团结型政治形态的关键，也是将解决问题、维护共同体的愿望和意志转化为现实的中介机制。习近平在《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最核心的政治制度模式也即政体——民主集中制，核心的逻辑就是团结。[6]根本政治制度的团结性决定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质，比如人民政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等所呈现的团结型政治的逻辑。本文主要以人民政协这个基本政治制度为经验基础，在比较国家治理的视角下，发掘团结型政治的制度结构和机理，探索其制度潜能，努力将政治实践经验理论化，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添砖加瓦。

一、“团结型政治”研究简述

21 世纪的世界政治表明，各国政治团结性或凝

聚力的程度或者有无，决定了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状况。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选举竞争和分权制衡的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政治学界热衷探讨的议题。与之相应，发达国家及其所掌控的国际发展政策机构为新兴的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系列与之适应的“好制度”和“好政策”方案，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推行西式民主。[7]民主和平论者认为以竞争性选举为主要模式的西式民主相对于其他制度形态最能促进政体内部稳定和发展。[8]具体机制是：其一，更充分的信息流通促进和平，公开选举的政治竞选规则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通过提供不同政治势力支持分布的真实信息，威慑实力较弱的对手或促使弱势在任者寻求权力分享方案避免内部冲突。[9]其二，选举民主政体下，反对派可以通过竞争选票的合法渠道而非暴力来争取权力，避免了直接使用暴力。第三，在多党制与自由媒体存在的情况下，反对派也可以制衡当权者行为，减少他们通过非法手段打压反对派的可能性，从而降低暴力对抗的风险，形成权力平衡。第四，在民主制度下，政府被普遍认为是合法当选的，反对派使用暴力会缺乏群众支持，从而更难动员有效反抗。最后，在压制竞争的体制下，反对派常常被迫转入地下，地下反对

力量更容易吸引激进、冒险主义者，这些人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手段，而民主制度中的反对派因为可以合法参与政治而更加多元、温和。[10]

然而，从事实来看，西式民主制度并没有促进政治稳定，反而通过选举动员推动认同政治，激化了种族、宗教、贫富等层面的社会撕裂，形成分裂型政治形态，导致内部冲突、政治衰败和严重的治理困境。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对非洲在引入西式民主制度后族群冲突频发的研究已汗牛充栋。曼斯菲尔德和施耐德早就提出民主化塑造了广泛的具有多元利益的重要政治群体，而在这种政治态势下，采取其所谓的族群竞价（ethnic outbidding）即族群动员模式是政治精英最容易获得认同和相应选票支持的方式。[11]曼也曾深刻地提出“人民”往往容易被狭窄地定义，在民族主义占主导、多族群对立严重、国家合法性不稳的环境中，选举民主制度可能滑向多数暴政，甚至极端的族群暴力。[12]埃菲特等人使用来自 10 个国家的民意调查数据证明，非洲的族群认同因选举竞争而加强：国家距离总统大选时间越近，调查对象的族群认同越强。[13]在从共产主义向民主转型的东欧国家，随着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深，左翼政党在选举中优势更大，因此右翼政党为了胜选，

引导选民注意力从经济利益转向宗教、种族等价值观问题上，来获得竞选优势。[14]而这一基于价值的动员策略不仅无法改善固有的社会不平等，反而更强化了认同政治的泛滥和社会撕裂。而在发达国家内部，选举民主同样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极化，形成了分裂型政治形态。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南方种族隔离体制彻底打破后才真正建立选举民主体制，开始面对多族群异质性社会的挑战。民主化后近几十年不断发展的政党极化，展现了美国民主体制的脆弱和衰败。[15]欧洲右翼政党同样不断诉诸“我们”和“他们”的竞选策略，导致了政治极化。[16]

虽然西方世界并不使用“政治团结”这一概念，而更多强调民主巩固和国家构建，但在西式民主走向政治分裂的背景下，如何促进政治团结事实上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并隐含在上述的研究和学术界的关切中。利普哈特提出“共识型民主”，林茨强调“国家性”，威默提出将跨族群包容性政治联盟的建立作为国家建构的关键步骤，都是西方学者在其知识体系内部的尝试性探索，但尚未触及政治团结这一概念。[17]如中国学者林尚立所言，团结与民主之间的内在统一越深刻全面，国家建设和发展越成熟；与之相反，缺乏团结的民主造成的是极化、

分裂和政治衰败。[18]而创造团结和民主的统一正是中共领导的现代化道路最核心的成功经验，其以人民政协的制度化形式确立下来。

与采取分权制衡和竞争性选举手段的民主政体相对，外文文献常常以集中制和威权主义概括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一二元的政体分类以最高统治权的分权/集权这一单一标准来定义民主/非民主，窄化了民主的可能模式，同时抹杀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促进集体认同和动员、融合的国家社会关系、稳定的政治环境上的成功经验和特殊性，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创造团结和民主统一的独特发展经验。

与西方学术界的路径不同，在国内的学术讨论中，中国学者则主动挖掘团结这一核心概念来阐述中国独特的现代化模式。部分研究从党史的角度探讨团结型政治的起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标志着中共为了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逐步凝聚统一战线，停止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由此团结成为中共革命实践中不断清晰化的重要命题和策略。[19]

关于当代中国团结型政治，张劲从宪法文本出发，强调中国政治体制并非西方自由宪法那般以保障人权、控制公权为旨归，而是以团结一致实现集

体目标为基本价值宗旨。[20]林尚立指出团结是国家建构的首要逻辑前提和民主的根基，一盘散沙的人民中无法生长出民主。[21]汪仕凯也认为人民内部的团结是施行民主的基础，民主也必须巩固和发展人民内部的团结，民主是促进团结的重要机制。[22]总结而言，西方党派政治竞争倾向于在保持政治活力的同时扩大政治分歧，中国共产党则将党和国家的政治团结作为最高准则来安排民主政治——这些深刻地反映在其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之中。[23]

还有研究则对中国政治不同领域的团结进行了具体阐述，主要讨论民族团结、党内团结、政党团结、党群团结。[24]民族团结上，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部分研究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促成了超越民族认同的跨民族团结。[25]党内团结上，一方面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以团结统一为底线发扬党内民主，施行民主集中制。[26]在政党团结上，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实践机制化解分歧、凝聚人心，促成了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27]区别于国民党、前苏联“一党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

“多党制”等旧式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的党际关系“平等但不对等、参政但不分权、监督但不制衡、合作但不同一”。[28]党群团结上，众多研究聚焦于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团结功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政治的战略性、枢纽性机制，团结朋友、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敌人，通过政治领导、价值引领、体系整合、过程吸纳和政策包容机制构建团结政治。[29]人民政协吸纳整合原子化个体和新的社会阶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并通过各种学习培训进行价值整合，以利益协调协商来促进社会团结。[30]

综上所述，目前对团结型政治的研究多集中于团结概念的内涵阐释、团结的重要性、团结及作为团结核心体现的统一战线战略的历史来源和演变以及特定维度的制度论述。目前的研究依然较为碎片化，对于团结型政治内在贯通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基于制度逻辑而形成的治理能力，缺乏深入分析。本文以人民政协为主要线索，整体性地呈现中国团结型政治的结构和机理，以及它所体现的国家治理能力优势。

二、团结型政治的结构与机理

政治团结这一命题面临三个核心问题：团结谁，谁来领导和组织，如何团结。本文采用“团结”这一中国共产党历史脉络中重要的政治概念来反映中国政治体制在处理社会多元性和政治参与时的路径——通过将政府及社会主体纳入围绕集体的核心目标的组织行为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共识和集体行动。而解答上述命题、实现这一路径的宏观制度逻辑，是由人民政协体现的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所构成的整体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政治价值。”[31]这是“两个结合”的新表述，鲜明地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什么范畴与中国实践和历史文化结合，也回答了中国的人民政协制度为什么具有独特的政治价值。大历史中的比较国家治理视角，更加能够彰显人民政协的独特政治价值——团结型政治的制度潜能和治理能力优势。

早在 1939 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在革命与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政治逻辑，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最核心的问题变成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因此就转化为统一战线、党的领导和民主协商的政治逻辑。[32]

三者的具体关系是：统一战线的战略在最大程度上凝聚个体进入组织，回答了“团结谁”这一命题，强调人；新型政党制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的组织制度框架，回答了“谁来领导和组织”这一命题，强调制度；协商民主则是组织内部具体协调成员关系、达成共识的决策方式，回答了“如何团结”这一命题，强调过程。团结的政治基础是统一战线，制度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内在机制是民主。[33]人民团结以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为基础，人民民主以人民团结为基础并促进团结。[34]三者结合实现了在大型共同体内部维持凝聚而有秩序的团结型政治的基本方

法。下文将具体通过“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的逻辑来阐释三者如何共同促进国家内部各权力主体的协调共存，实现团结。

（一）政治主体：统一战线

“团结谁”是共同体建设的首要问题。基于戴蒙德和费尔南德斯等人的研究，由于山脉分布和土壤肥力的地理差异，中国相对于欧洲更容易形成全面的政治统一，而非分散的多国家网络。[35]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路径和政治观念——社会史路径下的竞争性资源分配和政治史路径下的大一统民心政治。[36]自从秦汉建立天子官僚制，中国便形成了社会整合与政治统一的共同体，即使在分裂时期，大一统的政治逻辑依然成为政治家和精英们的自觉追求。[37]

进入近代，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开始就是追求“统一战线”的政党。《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实践中，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和列宁建立领导的第三国际，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国际团结的典范。作为第三国际东方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自然秉承了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统一战线”传统，并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将其发展成为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组建的国共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组建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战时期组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组建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均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反对主要敌人或实现一定的战略任务、最大化政治联盟以进行革命与建设而建立的。

事实上，新中国的“立国时刻”就是统一战线的结晶，各大民主党派“北上”，与共产党一道协商制定了宪法属性的《共同纲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虽经历过迷失，但改革开放后又重新提出爱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38]这一路径的精神实质离不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最大联盟以实现战略目标，这与人和人之间多元竞争形成制衡的底层政治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改革开放以来，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吸纳尽可能多的个体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其共同为此集体目标而奋斗。

统一战线落实在具体制度安排上的典型设置就是政协制度。作为中国统一战线的官方机构，人民

政协将独特的界别而非区域设置作为组织形式，容纳各政党、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其他各有关方面人士参与，以最大程度团结不同社会经济利益和政治群体。[39]如今的爱国统一战线包括了经济界、对外友好界等职业性界别，共青团、全国工商联等团体类界别，民盟、民建等党派类构成的组织界别，以及三个综合界别，共 34 个界别。这一界别设置把社会新阶层有效组织起来，促进他们进行制度化合法化的政治参与，成为统一战线的一员而非分散的利益代表，同时通过沟通促进阶层间的协调和凝聚性，形成统一团结的局面。[40]由此政协制度成为凝聚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形成有序政治参与的关键制度设计。

从大历史的比较视野来看，统一战线具有必然性和优越性。如上所述，中国是以“合”即大一统身份进入历史的，先秦时期大一统国家观就形成，秦汉确立了大一统国家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形成统一战线的思想与实践，促进了不同政治主体凝聚并合力推动国家发展。相对而言，西方是以“分”即“多统”身份进入历史的，古希腊就有 158 个城邦国家，经过两千年的战乱最终形成以民族为单元的所谓的“民族国家”，弹丸之地的欧洲就有 30 多

个民族国家，由此形成了稳固的多元分散、斗争制衡的思想传统。今天，西方多元主义的传统在继续发酵，演变为身份政治、认同政治和分裂政治，形成了“否决型政体”。除了对外搞政治斗争，比如成立“五眼联盟”企图加强其数字霸权控制，国家在内政问题上也难以有大的作为。中国的“合”形成的向心力与西方的“分”形成的离心力，优劣之势一目了然。

（二）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

解决了“团结谁”的统一战线问题之后，“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41]联合和团结的基本前提是自身的稳固存在，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权力结构上，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建立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基于权力分享与吸纳的包容性党际关系，为国家治理的稳定权力结构奠定了制度基础。[42]具体来说，党的领导这一特质具有根本规定性，确保了执政党在政治原则、政治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各参政党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由此形成价值认同领域的高度统一，

维护了基本的统治权问题，而不易产生根本性的政权颠覆，这是维护秩序和进行国家治理的根基所在。在统治权之外，强有力的执政党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碎片化的社会力量博弈，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为超越财产阶级的效忠和认同提供基础，成为一种公共政治力量代表公共利益。[43]

不同于西方旧型政党制度中政党间关系更多表现为对抗和竞争的情况，人民政协呈现的新型政党制度中，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基于共同政治目标的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并提供持续的监督、咨政建议和支持而非掣肘。[44]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广泛分布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以参政党的角色身份利用自身领域优势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与实施，为经济的增量发展注入进一步的活力，成为政治决策和政策执行以及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一环。[45]“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46]

政党协商制度是参政党和执政党合力治国的主要制度形式。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将政党协商列为七种类型协商之首，协商形式包括协商座谈会、情况通报会、高层协商

会、约谈和书面协商等形式以及最重要的人民政协协商。人民政协中参政党和无党派人士占据大多数席位，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非中共委员占 60.8%。[47]中国共产党在各项重大政策制订前和过程中都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政党协商，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人事协商座谈会、调研协商座谈会等。[48]中共中央总书记每年固定召开 4 次协商座谈会，分别就经济社会发展建议、半年度经济工作、中央全会文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等内容与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协商。[49]根据周淑真 2015 年的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或中央委托相关部门召开的座谈会、协商会和情况通报会每年平均 24 次，其中每年中共主要领导同志出席或主持的占 4-5 次。[50]全面深化改革、法治中国建设、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京津冀协同发展、“十三五”规划等重大决策的制定出台，都多次听取并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51]新型政党制度确保了统治权稳定的前提下和谐的党际关系和秩序。

比较视野下看中西政党性质和功能的差异。在“分”文化的西方国家，政党就如其英文“party”，只是部分人的代表者；在“合”文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者。这源于共

产党的起源。《共产党宣言》宣称，其他政党都是私利的代表者，只有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和方向。这是共产党的**先进性**。赋予先进性政党以力量的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性和纪律性将先进性政党变为**先锋队政党**。在所谓新型政党制度，即以具有先进性和力量性的公共力量政党作为执政党的政党制度中，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非旧政党的立党为私执政为己，党际之间是有领导的合作关系而非无底线的竞争。有了这样的先进性政党和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式现代化势在必然。

在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第一个模式是英国-美国的以商业集团为主体推动的国家现代化，这段历史在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被建构成社会中心主义或者个人中心主义；第二个模式是德国为代表的行政官僚制所推动的国家现代化，这段历史被建构成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的国家中心主义。然而，不但社会中心主义不能解释中国的现代化，国家中心主义也不能解释，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先进性、力量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在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应该有一个“政党中心主义”。[52]

没有自己利益的共产党是一种公共性政治力

量，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作为公权力的国家权力，第一次掌握在一种公共政治力量手里。历史悠久的帝制无疑是一种权力家产制，而代议制下的“议会主权”意味着权力掌握在有财产阶级的手里，而共产党领导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公共政治力量掌控公共权力，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质变和深刻革命。

几千年来，公权力掌握在公共政治力量手中的历史还很短，势必冲击着历史更久远、范围更广泛的公权力私有化的历史和现状，因而势必会被围剿、围堵。但是，政党主导型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改变旧的世界秩序。新型政党制度也必然冲击世界政治制度史，成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构筑团结型政治”理念的重要技艺和经验。

（三）政治过程：协商民主

人们早已习惯地认为选举是民主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对此，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就批评这种狭隘的认识，任弼时提出“行动的民主”即鼓励群众行动起来去解决各种问题。不仅如此，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还把自己的政府称为“商量政府”，“有事好商量”。到了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人

民政协成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可见，协商民主一直是中共践行的主要民主形式。这种民主形式当然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协商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应有之义，著名的“盐铁论”、宋朝的君臣共治，都是协商政治的典范，廷议、学校和宗族祠堂是协商政治的主要形式或场所。“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不但是一种做人的态度，还是一种协商文化。以“协商”为主题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在世界政治制度史上可谓一种政治创举。

在政治过程中，协商民主成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式。协商民主强调通过对话、讨论和审议形成共识进行决策，在中国，其具体制度形式包括法律制定中的党内协商、党派间协商、社会讨论，政策制定中以座谈会、界别联组等会议形式为内容的政治协商等。[53]协商民主所服务的首要价值理念是科学民主决策和共识凝聚两点，即决策和团结，而非自由表达权的彰显。人民内部的团结是施行民主的基础，民主也必须巩固和发展人民内部的团结。[54]协商民主如何能够促进团结呢？

首先，协商民主考虑了秩序的可承受能力。目前主流民主理论强调社会运动、公民社会组织、协商实验、地方参与型政府、直接参与等不同举措，

都是在扩大参与，而忽视秩序的可承受性。而政党领导下的协商机制则使政党可以作为公共理性代理人“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55]一方面促使协商过程免于过度噪声、有的放矢地吸纳各领域意见，另一方面使协商能够在领导核心的主持下以特定政策目标为核心进行沟通，弱化了政策过程的政治性。2006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选举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发展协商制度而非扩大选举是自觉的民主化战略选择，能够在适度放开参与的同时保证秩序。[56]

其次，协商民主促进沟通与共识建立，有效避免社会撕裂。费什金认为目前的民主随着大众直接参与和公民投票的普及，更关注参与和政治平等，忽略了审慎协商的共识形成过程。[57]在选举民主的决策机制中，由于执政者被视为特定利益集团和选民团体的代表，为了获得稳固的支持很难偏离社会群体的原有立场，因此既存的偏好往往固化，利益团体之间缺乏沟通与彼此影响的过程。普沃斯基将选举民主的结果视为被规范的冲突，而非共识。[58]公共利益被视为私人利益的总和，破坏了审议的可能性、

对话和交流对个人偏好进行塑造的可能性。[59]既有个体偏好的简单汇聚与加总无法得出最优选项，且造成不同偏好之间的对抗，导致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协商民主则可以减少参与群体间的信息不对称，避免不同群体处于彼此的信息茧房，促进沟通与共识建立，并增强集体决策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一部分研究者质疑中国集权体制下的协商民主是一种伪民主，提出协商程序设计只是为了给官方议程创造更多支持，展示政策的合法性，而非鼓励民主参与。[60]然而，结构性权力的不对等造成的民主机制的脆弱是一个普遍机制，平等地威胁着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选举民主政体同样面临着结构性不对等造成的无效投票，这不代表着要“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协商民主的实践依然在完善之中，但首先，这一制度本身在处理后发国家迅速扩大的社会参与和促进科学化决策方面的优势是需要得到承认的。

今天，协商民主已经发展到各个层级和方面，贯穿于从中央到社区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包含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多元渠道。[61]从中央层面五年计划十年规划的制定，到省级以下政

府的听证会、专家咨询，再到基层治理中的“村民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已经遍及中国的政策和治理过程。人民政协即是政党协商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促进政治团结。因此，协商民主其实是“协商共识型民主”，共识政治对于对抗性政治的优越性不言而喻。

与之相对，西方民主的主要形式是竞争性选举，是多数决民主。竞争性选举是党争民主的制度安排，结果必然是对抗性乃至分裂型政治。其内在逻辑是：大选是政党之间的竞争，而政党的社会基础是阶级、民族或宗教，因此，竞争性选举就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宗教斗争提供了合法的制度化平台，这些形式的政治斗争最终是分裂性政治。世界上的国家为什么越来越多？联合国成立时只有 54 个会员国，今天多达 200 个左右，其中党争民主起了很大作用，比如党争导致苏联分裂为 15 个国家，小小的南斯拉夫也分裂为几个更小的国家。国家的分崩离析是分裂型政治导致的严重形态，常见的形态则是导致政府无所作为的“否决型政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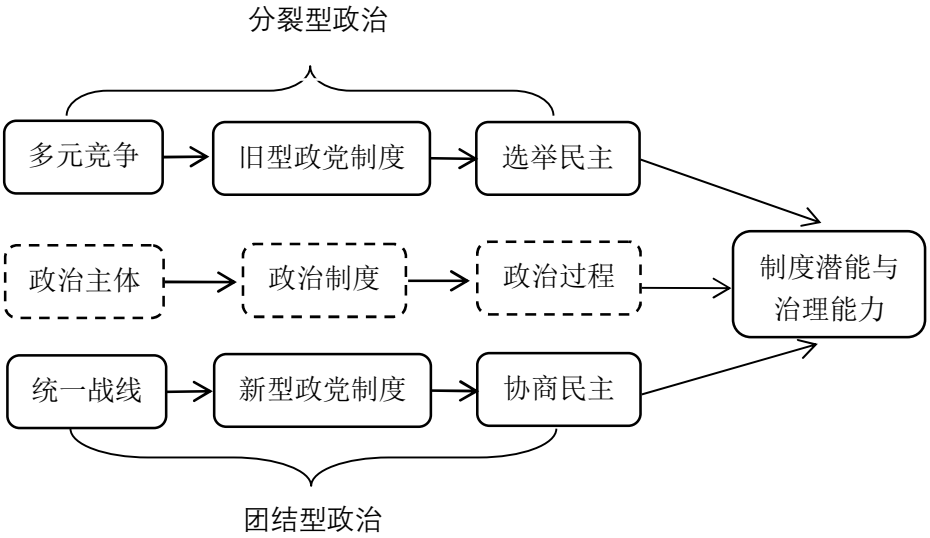


图 1：团结型政治/分裂型政治的结构与机理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综上所述，三者共同构成了团结型政治，对国家治理能力产生了关键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62]统一战线不断吸纳尽可能多的个体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集体目标，使其转化为整体性质的政治主体。新型政党制度确保统一战线内部领导权的稳固和秩序的稳定。协商民主则通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统一战线内部团结。三者共同构成了内部凝聚的作为政治实体的人

民。中国一直践行并将继续践行由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构成的团结型政治模式，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策略。接下来，本文将探讨这一宏观制度框架客观上对中国国家治理发挥的关键功能、带来的治理优势，阐释团结型政治的制度潜能。

三、团结型政治的制度潜能

团结型政治是中国政治制度呈现的根本形态。人民政协基本政治制度所呈现的政治团结性只是其中一个缩影，基本政治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的延伸。民主集中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共同构成了制度性的团结型政治。这种政治形态与国家治理有什么关系？

关于“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奇迹，有各种说法，比如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市场化和发展民营经济等，这些都有其道理。“中国之治”当然离不开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等经济要素，但比中国更开放、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能有效治理？因此，我们认为关键还是“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63]

大一统、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构成的“团结型政治”，正是“中国之治”的制度性根源。能保证统一和团结的政治制度，其政治优势显然是分裂性政治所无法比拟的。中国团结型政治形态维系了大一统的历史延续，确保了政策目标的确定性和长远性，汇聚政治势能促进政策变现，实现了团结与民主的交融，为“中国之治”提供了稳定政治局势并调动了各方积极性。我们之所以把这些优势性制度的功能称为“制度潜能”，无疑是说，团结型政治的这些优势的发扬最终得益于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成熟的政党和政治家集团，二者之间是倾向论因果，而非决定论因果。[64]

（一）大一统的历史延续

团结型政治的首要功能，是维系“大一统”这一中国根本性的政治命题。凡是拥有自己历史和文明的国家，都需要回答自己的“国家性问题”，缺乏对根本性命题的思考和回应，一个国家就可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65]对于中国而言，规模广大、缺乏断裂山脉海洋阻挡的平原地形，长期历史造成的同质化文明基因，都使得大一统成为了多民族共同体长久以来最富有经验和唯一持续的生存和生活方

式。[66]由此，大一统是中国人始终不变的目标。即使在短暂的分裂和低水平的割据平衡后，让治理体制取得突破性变革的权力中心往往能够打破分裂割据的低水平均衡，重建大一统。[67]“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了。唐室覆亡后，依然有明有宋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68] 大一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69]由此，不管从客观地理条件还是从强大的历史延续性造就的集体价值理念而言，正如众多学者的判断，政治大一统的延续是中国现代国家需要回答的首要“国家性”问题。[70]

大一统是广阔地理空间内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统一整合。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谓之大，政令制度标准统一即为一，协调兼容种种利益分歧是为统。[71]古代王朝国家时期，中国在郡县制、科举制等制度的支撑下，由士人阶层作为粘合剂形成向心凝聚的一体化结构，促成了多元民族一体化的超大规模共同体。

[72]然而在遭遇西方民族国家并且被强制纳入现代世界体系后，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组织方式。不同于以士人作为粘合剂，如汪仕凯所言，现代国家必须同民众形成直接的互动、建立直接的联系、直接面对民众的诉求和挑战、直接负责民众的安全和福利。[73]由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构成的团结型政治构建了当代维系大一统的制度形态，即实现不同政治主体之间利益平衡、凝聚共识政治过程的整合机制。在政党领导之下，广大群众凝聚为人民的统一战线，从而成为合众为一的共同体，并且依靠协商民主实现内部不同政治主体的持续互动和协调共生。由此，政治大一统的延续得到实现。

大一统延续的重要性在世界政治的视野下尤显突出。如前所述，国家稳定及其发展以国家内部凝聚为前提，在第三世界持续面临“强社会弱国家”的国家构建挑战，西方发达国家近年饱受政党极化争斗、阶级分化、身份政治等离心趋势之苦的情况下，团结型政治模式所带来的一统格局彰显了明确的治理优越性。对于中国来说，建立团结型政治、维护大一统的延续是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确保实现秩序与繁荣的前提和必然要求。[74]

（二）政策目标的长远性确定性

团结型政治塑造了共同体具有确定性和长远性的政策目标。中国之治的核心特质之一就是通过制度化的集体决策和连续性长期政策实现治理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长期执政，确保了政策方向的稳定性和长期规划的可行性，避免了政党轮替扭转政策进程、造就政策断裂，以长期核心利益为决策根据，注重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从历史纵深的角度去看当下决策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一以贯之的改革开放政策即是最佳例证。与西方多党轮替导致的政策反复和方向偏移不同，中国共产党确保了代际接力的改革开放政策延续。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阶段，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施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四十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这次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十二大到二十大，邓小平进行南方讲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在此过程中发展理念不断在继承前人基本目

标的基础上深化。如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所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长期不变的，一以贯之的”。[75] 这一制度框架确保了国家战略目标在四十余年间一以贯之，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四十多年的政策延续性和稳定政治目标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中都是罕见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深陷于民粹裹挟下的政策逆转、政党恶斗导致的战略迷失，以及领导人更迭导致的范式颠覆之中，比如不断经历军事政变的泰国、民主化后族群竞逐的尼日利亚，使用高福利民粹承诺吸引选民引起阶级对立的阿根廷。这些后发国家既缺乏稳定的领导集团，又缺乏一以贯之的政策延续性来积累政策信用和发展时效。

从具体的实现机制来看，中国一直坚持推行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党为领导核心，进行广泛协商，形成科学民主的发展规划，为国家治理提供凝聚共识、指引集体行动的行动指南。在长期规划上，邓小平在 1987 年党的十三大上就前瞻性地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设想。江泽民时期，“两个一百年”战略部署被进一步提出，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细化“两个一百

年”目标，提出新“两步走”战略，并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历代领导人集体在前人规划基础上不断调整具体内涵、分阶段进行突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历史耐心分阶段规划推进战略目标和长期愿景的治理智慧。在中期规划上，五年规划已是基本国策。从七五计划开始，历次五年计划都首先由作为核心决策机构的党中央提出五年计划《建议》。[76]党中央《规划建议》和国务院《规划纲要》的起草者之间形成紧密的人际网络，包括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其智囊、国家发改委各司局、部委所属研究机构、以及经济学家和顾问，符合实际经验的中长期规划最终从中形成，以指导行动。[77]

与选举型民主体制进行一个初步对比：选举民主体制中的政党轮替和不确定的任期限制促使政党将注意力投注于选举竞争与群众投票动员，缺乏足够激励进行中长期视野的规划。然而，任何高质量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长期规划，政治周期切割了缺乏足够共识的选举民主政体后发国家的发展韧性。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避免了竞争性选举制度下政党短期执政造成的短视问题，执政考验系于长期治理绩效，而非几年一次的选举设置。

官员具有制定中长期计划的意愿与能力，可以集中注意力思考国家长期发展的核心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Robert Engle）所言：“在中国为下一代制订五年规划时，美国人却只在规划下一次选举。”[78]稳定的长期规划进一步通过创造发展绩效消解内部冲突，增加基于绩效的政治信任和合法性认同，进而凝聚起超大规模国家的团结向心力，形成国家治理的正向循环。

（三）汇聚政治势能

团结型政治广泛汇聚政治势能，推动政策落实。在大规模国家的政策执行中，横向部门分割、纵向层级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共谋等问题普遍存在，易造成公共政策执行碎片化、政策空转、政策失灵。然而团结型政治下，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国家社会各个领域的政治势能的发挥，实现了从上至下的意志灌输，促使政策执行打破部门和层级壁垒，推动了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进而实现了良好的治国理政效果。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协商民主的政治过程则促进了各方主体的积极响应和协调。

政治势能概念最初由贺东航和孔繁斌提出，指

中国在应对社会发展和风险危机事件中所采取的对公共政策强力推动的政治行为，将中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特有的政党高位推动经验学理化。[79]团结型政治下，党中央通过建立党的工作领导小组、党政联合发文、党管宣传等有效的政策工具来汇聚政治势能，塑造地方执行者的注意力分配和议程设置；[80]一方面在党政体制内部突破制度惰性和部门割裂，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加强动员，以集体目标为轴心实现统一意志、激发组织活力、扩大政策宣传、整合社会资源。[81]

举国体制是团结型政治汇聚政治势能的重要体现。举国体制指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关键性的领域，由政府主导，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给予政策倾斜、资源倾斜和精神支持，动员和运用全国财力物力人力达成国家既定目标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即“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82]团结型政治为举国体制提供了政治基础，使国家能够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抓住社会系统主要矛盾，最大可能地动员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等各层次、各类利益主体参与到同一治理链条，团结推进集体目标。[83]

团结型政治下的政策执行模式以党中央的目标设定为轴心，团结不同利益主体、抓住核心矛盾、协调推进集体目标，避免了传统治理理论强调“政府治理”“公民社会治理”的二元争论，实现更紧密的政府社会关系和相应的治理效能。反观西式民主国家，地方自主权过大，加之三权分立机制使得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各自独立，政策执行由于缺乏政党权威或类似的统合性势力而频繁中断或者改变，不能形成有效的整合力量。[84]汇聚政治势能推动有效的政策执行，是中国团结型政治赋予政策执行的内在特征与优势所在。

（四）团结的民主与民主的团结

人民政协体现的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也正是人民政协的两大原则即“团结与民主”的深刻写照。统一战线和新型政党制度以团结为基础、也巩固了政治团结；有了政治团结才可能有协商民主，协商民主也巩固了政治团结。团结型政治塑造了团结与民主辩证统一的中国民主模式。民主是一种用于实现公共选择的制度手段，是一种政权安排。现在泛滥的主流民主理论皆存在一个错误的前提性假设，即民主是个人和社会的权利，

国家或政府只是被动地回应社会和民众的诉求，这种假设忽视了民主政体根本上就是**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的关系问题。**[85]团结型政治保障团结前提下的民主，促进民主基础上的团结，兼顾国家自主性和社会权利的重要性，实现了共同体内部的共识凝聚和导向发展的科学民主决策。

一方面，实现团结的民主，而非撕裂的民主。西式民主制度的核心定义是竞争性选举，通过个人意见加总的多数实现公共决策。然而，**民主的有效性前提是共同体的共识，而共识来自于由国家认同、共享信念、平等社会结构构成的同质化条件。**[86]在经济、种族、宗教异质性程度增加、价值观分化的环境下，以个人意见加总作为公共决策的实现手段，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容易导向政治斗争、价值观分歧、意识形态对立或文化冲突，乃至社会分裂。乌克兰内部分裂、尼日利亚族群冲突内乱、泰国反复的军事政变都是例证。在中国团结型政治模式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存在确保了社会共识的凝聚与维护，以及政治团结的加强。在此前提下，公共决策通过协商民主而进行，以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为核心，而非以个人意见表达本身为要旨。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和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考察工作，在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干部选拔的重要事项中，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不搞海推海选，不简单以票取人，进一步提高民主质量，坚持团结的民主观和实践。[87]在保障权威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诉求，克服分歧，避免一盘散沙，这就形成可治理的协商共识型民主。[88]

另一方面，团结并非强制集权的团结，而是民主的团结。团结型政治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广泛的协商、对话与合作使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在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基础上表达意见、形成共识，形成和谐有序的民主政治局面。这种团结并非基于强制，而是尊重多元、鼓励参与，以协商为主要形式，追求共识型民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实现。在现代化不断增强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当下，若民主支撑缺乏，民众的诉求无法得到有效表达和回应，抗争与动乱就极易出现；其次，若公共决策缺乏广泛的民意参与，政府成为所有公共活动的唯一责任方，任何风险挑战都会造成极大的治理压力。[89]因而团结必然以民主为基础，这也是团结型政治强调协商民主的原因。团结型政治模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协商民主，在公共决策和公共生活的全过程

贯彻民主，塑造了共同体的内部生机与活力。决策过程中广泛充分的协商民主也可以综合各方信息，避免重大失误，防止主观专断；还能对权力形成制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滥用。[90]

综上所述，团结和民主之间存在重要的互促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需要基本团结作为基础；而最广泛和深刻的团结，有赖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民主政治是二者平衡的治理艺术，最终是为了实现共同体内部的最大共识，促进民生和发展。民主的团结越充分，统一战线的团结效能越能实现最大化。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越团结，全过程人民民主越能有序深度发展。[91]中国的团结型政治框架重视并且始终不断尝试更好地协调民主和团结，也即一致性和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维护了国家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大盘。

四、结语：作为自主性概念的政治团结学

政治团结是共同体生活的核心命题与智慧所在，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类历史上关于政治团结的技艺。政治团结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重要的实践经验和叙事，是未来政治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增长点。1987 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

时提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92]政治团结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检验自身执政能力、评价政治制度的重要维度，在这一点上，学界的理论发展严重滞后于中国的政治实践。

本文指出了中国团结型政治的内在逻辑——以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三项制度构成的宏观制度体系，在比较历史的视野中第一次系统回答了团结谁、谁来领导和组织、如何团结三个关键命题。团结型政治维系了大一统的延续，确保了政策目标的确定性长远性，汇聚了政策执行的政治势能，构建了团结和民主互促的民主政治形态，为中国之治提供了独特的制度潜能。

政治团结命题是当下政治学者应认真对待的命题。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对于自身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和政党极化等问题的束手无策，彰显了其分权制衡、选举民主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和历史经验的局限性。中国作为人类文明史中具有最强历史延续性的超大规模国家，在国家整合和政治团结命题上拥有远超其他国家的丰富经验案例和技艺，应进一

步挖掘其理论价值，从而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政治团结学”无疑是一种自主性概念。

“政治团结学”不但要研究以政党团结为目的的人民政协所体现的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以及协商民主等基本政治理论，还要将这些原理运用到党政关系、军民关系、民族关系、种族关系、社会关系、地区关系和对外关系之中，从而建构出一套不同于以竞争性、对抗性分配资源为核心的政治学原理体系。这是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因为政治团结学不但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基因，更有成功的现实政治经验基础。

[1] 林尚立：《团结与民主：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5 期。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7 日，第 1 版。

[3] 郭静：《政治发展的实践演进与理论逻辑》，《政治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

[4] 林尚立：《团结与民主：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5 期。

[5]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6 日，第 2 版。

[6] 杨光斌、乔哲青：《论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 6 期。

[7]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蔡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

[8] Havard Hegre et al.,“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and Civil War, 1816-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5, No.1, 2001; H. Bartusevicius and S-E Skaaning, “Revisiting Democratic Civil Peace: Electoral Regimes and Civi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5, No.5, pp.625-640.

[9] J. Laurent-Lucchetti, et al., “Ethnic Conflict and the Informational Dividend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22, No.1, 2024, pp.73-116；Jose A. Cheibub and Jude C. Hays, "Elections and Civil War in Africa,"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Vol.5, No.1, 2017, pp.81-102.

[10] H. Bartusevicius and S-E Skaaning, “Revisiting Democratic Civil Peace: Electoral Regimes and Civi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5, No.5, pp.625-640.

[11]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1995.

[12] Michael Mann,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 Ben Eifert, Edward Miguel and Daniel N. Posner,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f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4, No.2, 2010.

[14] Margit Tavits and Natalia Letki, “From Values to Interests? The Evolution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New Democrac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6, No.1, 2014.

[15] [美]史蒂文·李维兹基、丹尼尔·齐布拉特：《民主国家如何死亡：历史所揭示的我们的未来》，李建兴译，台北：时报文化，2018 年。

[16] Milada Anna Vachudova,“Populism, Democracy, and Party System Change in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24, 2021.

[17] [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6-39 页；[美]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 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陈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 [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8] 林尚立：《团结与民主：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5 期。

[19] 王续添：《求同存异与团结斗争的政治学——瓦窑堡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知和政治选择》，《教学与研究》，2010 年第 12 期。

[20] 张劲：《团结宪章——宪法的中国意义》，《政法论坛》，2014 年第 1 期。

[21] 林尚立：《团结与民主：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5 期。

[22] 汪仕凯：《团结和民主的同构：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逻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 年第 4 期。

[23] 刘文珍：《团结型政治：中国共产党建构的一种新型政治模式》，《西藏发展论坛》，2023 年第 1 期。

[24] 刘学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思想探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25] 袁琳、袁银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

青觉：《制度自信视阈下的中西民族团结制度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4 期。

[26] 秦宣、颜杰峰：《党内民主建设与党的团结统一——“国外共产党分裂的历史考察”小结》，《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 年第 10 期；

邓磊：《画好三个同心圆：凝聚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探索》2020 年第 4 期。

[27] 周虎：《试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团结效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 年第 2 期。

[28] 黄天柱：《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 年第 5 期。

[29] 徐理响、胡文婷：《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统一战线视角》，《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 年第 6 期。

[30] 张凤玲：《人民政协的社会团结功能开发》，《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

[3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21 日，第 2 版。

[32] 林尚立：《团结与民主：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5 期。

[33] 林尚立：《人民、政党与国家：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学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

[34] 林尚立：《团结与民主：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5 期。。

[35] Jesus Fernandez-Villaverde et al.,“The Fractured-Land Hypothesi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3,.

[36] 社会史和政治史的路径划分早期研究见布罗代尔《论历史》，第 144 页。近期研究见杨光斌、李欢：《政治的概念——兼论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社会科学研究》,2023 年第 3 期。

[37] 钱穆：《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6 年版；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

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3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7 日，第 1 版。

[39] 严兴文：《新时期人民政协界别变化的特点及其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

[40] 高秉雄、张江涛：《人民政协界别：变迁与改革》，《社会主义研究》，2009 年第 6 期；谈火生、侯昕饶：《人民政协复合型群体代表机制探析》，《教学与研究》，2023 年第 6 期。

[4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论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09 页。

[42] 艾明江：《嵌入型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国家治理》，《理论与改革》，2019 年第 5 期。

[43] 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

[44] 杨德山：《试论新型政党制度之"新"：比较政党制度视角下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 3 期。

[45] 张献生：《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作用》，《政治学研究》，2017 年第 4 期。

[46] 习近平：《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 562 页。

[47]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3 月 3 日，https://www.rmzxw.com.cn/c/2023-03-03/3303500.shtml。

[48] 陈家刚：《政党协商：内涵、特征与价值》，《学习与探索》，2019 年第 6 期。

[49] 孙春兰：《着力推动政党协商深入开展》，《求是》，2015 年第 11 期。

[50] 周淑真：《政党协商机制建设之参政党协商能力研究》，《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5 年第 4 期。

[51] 陈家刚：《我国的政党协商：实践、挑战与前景》，《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

[52] 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53] 马一德：《论协商民主在宪法体制与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1 期。

[54] 汪仕凯：《团结和民主的同构：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逻辑》，2024 年第 4 期。

[5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 年 9 月 21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09/21/content_2753772.htm。

[56] 何包钢：《协商民主：理论、方法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33 页。

[57] [美]费什金，《倾听民意：协商民主与公众咨询》，孙涛、何建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213 页。

[58] Adam Przeworski, *Cris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63.

[59]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442 页。

[60] Tiantian Zhao, Rene Trappel and Guoming Han, “Maybe listening to the elite? Selective Deliberation as a Governance Tool in Rural China”,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65, No.1, 2024.

[61]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https://www.gov.cn/xinwen/2015-02/09/content_2816784.htm。

[6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16 日，第 1 版。

[63] 杨光斌：《历史本体论与政治的弹性：政治作用的历史政治学研究》，《社会科学》，2024 年第 10 期。

[64] 费多益：《倾向：因果观念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9 期。

[65] 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0 期。

[66] 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第 16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67] 赵德昊、周光辉：《体制变革：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江苏社会科学》，2021 年第 5 期。

[68]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3 页。

[69]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70] 王向民、陈立业：《“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 年第 7 期；汪仕凯：《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解释》，《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李欢、任锋：《民主集中制与大一统国家的现代建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 年第 4 期。

[71] 苏力：《大国与大一统，以及帝国》，《开放时代》，2023 年第 1 期。

[72] 姚中秋：《以国家整合为中心的大一统理念：基于对秦汉间三场政治论辩的解读》，《学海》，2022 年第 5 期；陈明明：《中国政府原理的集权之维：历史与现代化》，《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 年第 1 期。

[73] 汪仕凯：《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解释》，《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

[74] 赵德昊、周光辉：《从大一统到统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学海》，2024 年第 1 期。

[7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7 日，第 1 版。

[76] 鄢一龙、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中央政府决策模式演变——以五年计划编制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

[77] [德]韩博天：《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石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版，第 171 页。

[78] 王绍光、鄢一龙：《中国民主决策模式：以五年规划制定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26 页。

[79] 贺东航、孔繁斌：《重大公共政策“政治势能”优劣利弊分析——兼论“政治势能”研究的拓展》，《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 年第 4 期。

[80] 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 20 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王立峰、孙文飞：《新时代党政联合发文制度的“政治势能”优势及其治理效能》，《河南社会科学》，2021 年第 9 期；贺东航、高佳红:《政治势能:党的全面领导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一个分析框架》，《治理研究》，2021 年第 5 期；杨志、曹现强：《高位推动、注意力配置与中国政策扩散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

[81] 贺东航、孔繁斌：《重大公共政策“政治势能”优劣利弊分析——兼论“政治势能”研究的拓展》，《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 年第 4 期。

[82] 谢宜泽、胡鞍钢：《新型举国体制：时代背景、基本特征与适用领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 年 11 月 6 日，第 1 版。

[83] 黄瑶、王铭:《新型举国体制对防控新冠疫情的制度优势》,《公共管理研究》，2021 年第 2 期。

[84] 贺东航、孔繁斌：《重大公共政策“政治势能”优劣利弊分析——兼论“政治势能”研究的拓展》，《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 年第 4 期。

[85] 杨光斌：《政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

[86] 杨光斌：《论西方政制危机之政体条件原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 年第 7 期。

[87] 张树华：《比较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特征与实践方向》，《当代世界》，2023 年第 3 期。

[88] 杨光斌：《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表述问题》，《政治学研究》，2022 年第 1 期。

[89] 赵汀阳：《一种可能的智慧民主》，《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

[90] 佟德志：《治理吸纳民主——当代世界民主治理的困境、逻辑与趋势》，《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

[91] 樊士博、徐敏：《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团结与民主的辩证实践》，《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 年第 1 期。

[92] 邓小平：《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13 页。



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